

读书随笔

岁华摇尽 芳意同香

——闻一多与陈子昂的英雄诗境

彭磊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长河里，闻一多先生与其他作家相比同时具备了个人主义和入道主义两种精神气质，当他以自己的牺牲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发展历程标注一个永远的惊叹号时，穿过个人主义和入道主义两个标签，我们看到了英雄主义的产生。这种秉承中国文化传统的追求真理的英雄主义在外部获得极高的响应和评价。

然而，闻一多的内心一直是孤独和感伤的，他一直保持一种逆境中长期压抑和叛逆心理，这不能说不为时代赋予他走向壮烈和爆发的心路历程，这也构成他的诗歌中一种忧愤到爱，爱至忧愤的情感色彩和现实情怀。

在闻一多钟爱的唐诗领域里，唐朝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者陈子昂的人生境遇和诗歌情绪相隔1000多年时空和闻一多竟成了莫逆之交，惺惺相惜。这也可算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

闻一多给陈子昂留下了相当的篇幅和笔记，以表达对诗人的喜爱：“子昂的诗古今独步，几乎众口一辞，无人否认”。闻一多认为“中国伟大诗人可举三位代表，一是庄子，二是阮籍，三是陈子昂。”这里没有李白、杜甫，联系闻一多评述“李白高而不宽，杜甫宽而不高”，实乃明白为何闻一多对陈子昂情有独钟，那就是陈诗中传递出深邃哲理和现实喟叹，符合闻一多从浪漫的《楚辞》意境开始，又直面《死水》一般现实的诗歌审美历程。

闻一多认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一种从个人出发而联想时空的大无涯的创造，属于“诗言志”的完整表述。“子昂能忘记自我，所见为纯粹的真理，但又不是纯客观的。”闻一多认为李白解脱过多，过于超然世外，是一种人生的旁观者，杜甫则沉湎现实纠结，痛民生而失生命之本真和飘逸，反映出的是生之疲乏，而不是生之趣味和盎然爱意。只有陈子昂的诗得中而和，即“有关切的凝思，又可作严肃的正视”。从闻一多的《死水》《太阳吟》《红烛》可看出，闻一多和陈子昂在

诗境上的千年唱和。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死水·口供》)

闻一多在表达灵魂纯洁、热烈的家国爱恋和雅致情趣时，仍然要强调苦难现实对前面那些理想和情感的牵绊甚至是摧残。“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诗人完成了生之趣味、生命炽热的感受到生之疲乏和现实痛苦挣扎的自我转换，在短暂迷醉一时的抒情和欢乐之外，他的内心深处紧紧连着沉痛的现实割舍不了，摆脱不了，导致“我”只能是“苍蝇的思想，垃圾桶里爬”。在达成灵魂情趣之高洁，照射现实之宽深的中和后，诗人闻一多由此获得创作尽兴和自由。这样的诗境可在《死水》和《红烛》看到。

闻一多的诗歌力图依靠《红烛》和《死水》等名篇来支撑，其爱国诗人身份是这些伟大诗篇来奠定的，后人所能记住和传唱，也就是这些爱国的现实感刺痛的诗歌。《死水》完成了诗人对冰冷丑陋现实的把握和理喻，与之对应的是往上升起，暖意洋溢，照亮心灵的《太阳吟》和《红烛》——

“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烘干了小草尖头的露水，/可烘干了游子的冷泪盈眶?/……太阳啊，自强不息的太阳!/大宇宙许就是你的家乡罢。/可能指示我，我的家乡的方向?”(《太阳吟》)“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死水·祈祷》)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离开你/离开你/母亲!”(《七子之歌》)“长城啊!你何曾隔阂了匈奴，吐蕃?你何曾障碍了辽，金，元，满?……/古来只有塞上的雪，古来只有塞上的烽烟，古来只有胡虏载着一个佳人，抱着



琵琶泣泣驰出了玉关!”(《长城下的哀歌》)

闻一多的情感世界冷静而炽热，高远而宽博。他痛贬现实又挚爱祖国，这构成闻一多诗歌的直面现实、坦露心迹、真诚而勇敢的英雄本色。

这样一种英雄情怀的诗品，在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中可看出：“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城北，孤塞障云中。/勿使燕然上，唯留汉将功。》)(《送魏大从军》)全诗充满昂扬向上的精神，表达出诗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诗之三十五)的英雄情结，感情豪放激昂，慷慨悲壮。

从一种视野宽广、情感真挚、意境高亢的诗歌出发，闻一多和陈子昂除了以上的英雄气色外，他们诗作中的孤独感，在各目的时代显出沉重和厚重，似乎都在积蓄着爆发的力量。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盲飙忽号怒，万物纷相簸。溟海夜漫漫，孤其所如何。”等等。

闻一多的“不幸的失群的旅客!谁教你抛弃了旧侣，拆散了陈阵，流落到这水国的绝塞，拚着寸碟的愁肠，泣诉那无边的酸楚?”(《孤雁》)“我是个年壮力强

的流囚，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黄昏时候，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幸福底朱扉已向关上了，金甲紫面的门神举起宝剑来逐我;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我是一个流囚》)愈有才华，愈有情怀和抱负，也就愈有孤寂感甚至挫败感，古今诗人都不能幸免。因为自己的努力、视及所穷，力不所遇，往往和周遭产生超前的距离，一种先锋的孤单也就产生了。在闻一多和陈子昂的诗歌中，都能触摸到一颗孤独的心，在这样的孤独和倔强中，诗人期望人生后程的砥砺前行，然而磨难是今天的现实，新生有可能是永不能抵达的明天。

公元696年，陈子昂满怀英雄情绪和书生意气，针砭官场垢病，指责上司失策导致朝廷在北方的平叛失败，最后遭人陷害，二度入狱，而被人害死狱中。1946年闻一多面对特务手枪拍案而起，怒斥现实，同样为当局所不容，乃至被害牺牲。从人品、人格、境遇和结局，两人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又何等让人敬佩!

任何时代都有其精神的缺乏、价值的沦丧之处，构成时代精神坐标的并启示后人往往是那些注定孤独、甚至失败的先哲们。但是作为自由和真理的信徒，他们替所有的跟随者，包括胆怯者完成属于所有人对时代质问。情怀之后是探寻。诗人本身也许不能寻找到答案，但它告诉人们答案隐匿之处和求索的方向。

陈子昂之于闻一多就在于前者是埋藏于历史缝隙中的一丝光亮，挣脱出岁月的挤压而给后人于前进的映照和慰藉。

闻一多之于陈子昂就在两位不同时空的伟大诗人，构建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价值链条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线索。引领时代风气，构筑民族文化灵魂。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岁华摇尽，芳意同香。像闻一多、陈子昂这样由多个个体联合起来，汇聚成无穷无尽的生命潮流，奔涌而来。

2017年：这些人和书影响了中国

张光范

回望2017年，哪些人和书值得珍藏?哪些人和书影响中国?我们从不同侧面来梳理一下。

周有光：“拼音之父”的醒世警言

2017是文坛告别之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离世。周有光先生的“汉语拼音方案”造福世人，惠泽数代。他是一位通达、乐观的知识分子，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史进派，匹夫有责”的情怀，以及宁静淡泊，生活清贫简朴，思想无比富有的生活态度。周有光最可贵特点，是一直关

注世界的最新发展，并站在时代的前沿。百岁后相继出版的《朝闻道集》《拾贝集》《静思录》《百岁所思》等著作，展现了他“要从世界看中国”的人生智慧。以前，他总爱说：“上帝也老了，把我忘掉了。”而今，上帝终于没有忘掉这位112岁的老人。有人问周有光有什么经验可以留给后人?他说：“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阎崇年：寻求解读历史新突破

从早年走上《百家讲坛》后，历史学家阎崇年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5月，他出版《御窑千年》，认为最大热门“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实际也是一条瓷器之路。他坦言，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国名，既是瓷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自豪。书中，他通过“瓷器之路”传递中华文化，以历史启迪智慧，还原了历史的本真与残酷，分析让人感到深刻真实，使人感到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阎崇年看来，宫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了解其精髓，则必须通过其载体——御窑。皇宫有御窑，能成其大；御窑为皇宫，更能显其贵。阎崇年立足于千年中国历史，品味御窑瓷器的传世精品，纵论御窑的兴与衰，透视瓷器的情与趣。历史的观察，人文的叙述，以小见大，寓理于器，淋漓尽致地展现御窑及瓷器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一面。

《朗读者》：以文学之名叩问生命

从《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到《朗读者》，2017年多档文化节目接连“火”遍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央视主持人董卿说：“这是时势造英雄，人们需要把心放在文字里，《朗读者》刚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需求。”在每期节目中，年龄、职业、地位、身份各不相同的朗读者，都深情地朗读一段文字，为父母、为子女、为配偶、为学生、为朋友、为观众、为自己……每一期都有不同的主题词，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第一次、眼

泪、告别等。聆听嘉宾的人生故事，聆听一段与主题有关的朗读，《朗读者》带给中国太多的感动和力量。“以文学之名叩问生命”是《朗读者》的灵魂。8月，董卿主编的同名图书出版，以节目为基础，增加文学含量，提升阅读品质，是图书的编纂追求。读者为一些朗读者的人生故事感动，为一些朗读者的情感感化。感动、感化之后，我们该怎样拓宽自己生命的厚度，这或许是喜爱《朗读者》的观众值得思考的。

石黑一雄：记忆与遗忘的时代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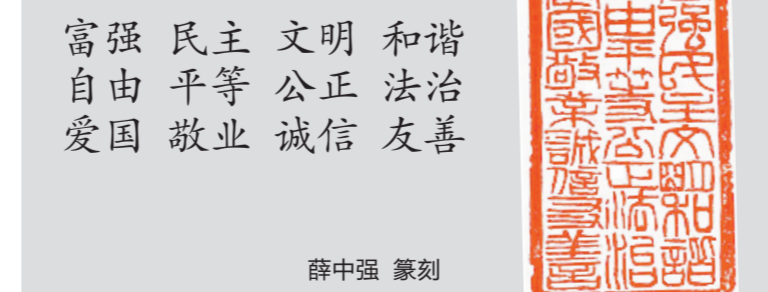
10月，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表彰他“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作家三雄”。他的作品不关注特定国家、民族的灾难，而试图探讨变革中人们内心的感受。《远山淡影》《长日留痕》等作品，确立了他在移民文学上教父级地位。石黑一雄是“动人的咏叹过

去的诗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作家。“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源头。我们的爱会不会枯萎、死亡?”他对回忆有着极深的理解，在他的巨著《被掩埋的巨人》中，关注的是杀戮面前，要真相还是遗忘?石黑一雄想借此探讨：一个个体、民族和社会，究竟应该记得什么，又该忘记什么，如果这记忆和他未曾生逢的战争一样，能给他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那么又能给所有人带去什么呢?

周梅森：人民的心声与期盼

3月，《人民的名义》成为刷屏全场的现象级作品。电视剧刚一播出，便收获观众热情的点赞。剧集热播期间，《人民的名义》原著纸质书销量增长21倍，电子书增长191倍。除了跌宕的剧情，精彩的表演，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反映着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回应着反腐败的民心所愿。

周梅森以《人间正道》《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政治小说为人熟知，《人民的权力》里的很多情节，不仅来自真实的社会新闻，也源自他的生活。周梅森坦言：“《人民的名义》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反腐小说。”当然这也是一部让人民群众满意和欣慰的作品。因为作品道出了人民的殷切心声和真心期盼，向腐败分子亮出了正义之剑，让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宛如一股清流。以人民的名义，是反腐的动力，更是反腐的意义。



薛中强 篆刻

新书推荐

乡村、城市与现代生活的诗意联系

纪梅



鸟鱼 最易上钩的季节

一块整齐的豆腐/锄头切进泥土，声音干脆柔和/(一袋谷倒进粮仓的声音)“(翻地)”;而对待后者，诗人多持否定、拒斥和批判的态度：不仅“芦苇、水草、杉树、渔船、鸬鹚、白鸥一夜消失”(《鹊巢》)，所谓的城镇化建设或导致家乡频改地名：“原来地名从此作废，仅限流通于/老一辈人的记忆和话语”，或导致人们《失所》《失地》，失去“祖坟”：“地图上没有平民墓地的名称/楼层层层推进，仿佛分裂生殖的移动城堡——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在抵达故乡的傍晚/游子绝不可能找到祖坟，还有许多人”(《地名》)。能够进入诗歌的“城市生活”，多集中于诗人的书桌或卧室：“你迷恋词语，胜过其他的事/搬来或移走它们，塑造出各种风景。(不管早晨，还是晚上，坐在/本来是饭桌的书桌前——上面堆满书、稿纸、笔记本和诗集复印件。)(《词语》)“一个人的寂静，我沉迷其中/像个小额贩忘掉世界抹点口水反复数钱。”(《酒醒后打开一本诗集》)。

诗人张翔武离开湖南老家来到昆明读书已有16年，但他好像从未离开家乡太远。他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将在家乡的观看、经历和体验描述给你听：动物、植物、鱼禽，夏夜落水然后被父亲救起，“和爸爸晚上去抓青蛙”，“鸟鱼最易上钩的季节”以及“一只小鸟重重地蹿起/投入雾气更浓的远处”(《雾里鸟叫》)的飞翔姿态……保罗·瓦莱里曾将诗人对故乡对于故乡小村庄、钟爱和逝去的东西的怀念称作“迟到的热爱”，这种热爱包含着“对地方色彩和祖先的崇拜”，“对于或真或假的根或深或浅的需要”，以及“对于几乎是植物的环境的怀念”(保罗·瓦莱里《文艺杂谈》)，在张翔武的写作中，对故乡“迟到的热爱”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除了对过往经验的描述，故乡也作为一种修辞延伸在今日的城市生活中：“汽车碾过夜晚，/不知哪个书架/偶尔吱嘎作响，/像大雪沉沉覆盖/屋后几根橘树”(《六月夜读》)。大雪覆盖屋后橘树的场景属于回忆中的故乡，诗人当下生活的昆明，夜晚多为汽车声所陪伴。这是我们颇为熟悉的故乡经验。在昆明的某个房间，书架代替了故乡的橘树。这一修辞与诗人爱书有关，与书来源自树木有关，更与诗人对故乡的思念相关。

诗人曾言：“如今，我逐渐明白只有离开，才能从远处看得更加清楚。”(《鹊巢》)从远处回望，真的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吗?回望的需要，是否会因为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将过往生活景致化、浪漫化?新近出版的诗人诗集《鸟鱼最易上钩的季节》(云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12月版)，是诗人多年创作诗歌的一次总结。诗人对待乡村和城市(或乡村“城镇化建设”)态度的二元对立结构成为重要主题：他对故乡过往的回忆和描述带着挽歌式的深深眷恋和乡愁似的怀旧情愫，如“扛上锄头，我去翻地，/那块不大的荒地土壤板结，/一锄一锄下挖，锄头，/切进泥土，泥土又咬住锄头，/翻开的泥土因为潮湿而显深褐色/散发一股泥腥味像

在我们想安静入睡时，一切声音都是噪音。然而当我们半夜醒来并陷入失眠的漩涡时，声音——特别是人发出的声音——成为一种安慰。本雅明曾发现正是人群构成了城市巨大的魅力来源。“至少这时候/这世上并非我一人没法睡觉”(《酒醒后打开一本诗集》)，这是颇具现代性的体验。这样的时刻凸显出孤独的个体在现代生活深深感受到的与他人相联结的需要。正是城市，在更多的时刻为“孤独的群众”提供了“相互展示的空间”，使一堆“悬在孤单和传播之间”的“单子”“在互相匿名匿名的情况下摩肩接踵”，融化其间(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在现代生活，不仅灯光、书和词语，还有陌生人的汽车声，提供着传统的家宅、鸡鸣狗吠和亲人所具备的庇护所功能。此时，诗所展现的经验和感受，相较于简单的城乡二元对立和道德姿态，要更为细腻、复杂和真诚。诗人不再寄托于对消逝过去的怀念，而愿意驻足此刻，进而发掘生活的真实、意义和美。

娜嬛瑛珍

春城无处不飞花

孙永庆

对曹清华先生最初的记忆，缘于《小米的回忆》。在学校学过了他的《小米的回忆》，后来也查过他的资料，曹清华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和教育家，曾任《世界文学》主编，还曾获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友谊勋章。译者有《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等，被鲁迅誉为“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翻译家。著有散文集《春花》(《春城飞花》《飞花集》《望断南来雁》《天涯处处皆芳草》)《曹清华散文选》等。

近40篇散文，写人记事的占了绝大多数篇幅，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占了一半。曹清华先生最初与鲁迅先生见面是在1922年，1925年协助苏联汉学家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他开始与鲁迅先生通信，又参加了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社，和鲁迅先生交往密切。在苏联任教期间为鲁迅先生搜集版面、插图等资料，鲁迅先生出版的版面集《引玉集》，就是曹清华先生搜集的。曹清华的著名译作《铁流》也是鲁迅先生之约，在苏联列宁格勒任教时着手翻译的，鲁迅先生编校出版的。这些散文记录了与鲁迅先生交往的过程和感受，对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刻理解，对鲁迅先生的深厚感情，融进了散文的字里行间，读来情真意切，又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飞花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8年5月出版，选入了作者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文字。“在繁花似锦的祖国大好形势下，掀拾唐代似锦的‘春城无处不飞花’之句，将集子名为《飞花》，聊表感戴的衷情。”(《后记》)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多么好的书名，既点化了散文集的意境，也抒发着作者的时代情怀。自然这些散文也烙上了时代的烙印，有些散文过分注重思想性，但在那样的环境里能写到如此程度，已属不易。写云南、福建、广西的抒情散文，还是蛮好的，如《洱海一枝春》被选入《中国现代散文欣赏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学者金志华在赏析中说：“它风格清新明丽，就和他描绘的大理一样，浑然天成，如诗如画而又不显雕琢。”这些散文描写西南到西南边疆的社会生活和山水风貌，像一幅幅浓郁的边疆风情画，字里行间浸透着时代的气息，也透出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由衷赞美。